

中国新闻名专栏 社评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国家赔偿：关乎每一个公民的权益

据新华社报道,在近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国家赔偿法》修订草案再次提交审议。修改亮点包括:第一,国家赔偿不再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为前提;第二,对公民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只要结果是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受害人都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举证责任倒置,赔偿义务机关应对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供证据。

《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体现一种法治理念的转变,是在告诫、督促司法、行政机关,审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最大限度地避免错捕、错判,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与正义

最终是否损害了当事人权益为赔偿依据,而不管权力的行使是否违法。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违法”的前提,导致一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国家赔偿等同于错案追究——赔偿即意味着有过错,不仅可能被追究个人责任,而且可能影响以后的仕途升迁和政绩,这直接导致了一些赔偿义务机关的抵触情绪。而该赔不赔又极易引发一些受害人的上访,乃至重复上访、越级上访,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强调“违法”,无疑有利于受害人顺利获得赔偿。

而要证明这一点,对于受害人及其家属来说很难。让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不仅保护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而且限制、规范了权力的行使。进而言之,《国家赔偿法》的上述修改体现的是一种法治理念的转变,是在告诫、督促司法、行政机关,审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充分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最大限度地避免错捕、错判,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与正义。

国家赔偿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纠纷解决的途径和载体之一,关系着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益和命运,更关系着法治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也许此次修改不能解决国家赔偿制度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但“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走向完善的每一步都值得肯定。

□张培元

“14亿元红包”好沉重

一家亲子育儿网站近日在上海发布了一份《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披露中国有24%的产妇送红包给产科医生,200元~300元/个的占30%,500元/个的占20%,800元~1000元/个的占26%。据推算,每年产妇和医生、助产人员之间的红包收受金额可能高达14.856亿元。(见6月24日《广州日报》)

红包多送14亿元,还只是对产科的预测,如果放大到整个医疗卫生领域又会是多少呢?恐怕是个天文数字。从最初的一袋土特产,到紧俏的邮票、粮票,再到成百上千元的现金、购物券,红包越做越大,红包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近些年来屡刮屡长的歪风,成为白衣天使群体的一大羞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广东高考作文中,有考生居然将一些医生向病人索要红包的行为视为“常识”。常识在莘莘学子头脑的颠覆,从侧面印证了畸形红包在社会的泛滥。

医患曾被称为德中之德。小小红包可能似无数白蚁,蛀蚀毁梁,使整个大厦摇摇欲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峰针对红包腐败对医生的腐败,怒斥道:“一些医生眼里只有‘病’没有‘人’。”《中国青年报》曾经作过一项调查,内容是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结果排在第一的是医生。人们担心,当良知被金钱吞噬、医道遭物欲扭曲之时,妙手回春可能变为“棘手摧春”。

一家网站关于产科大夫群体收受14亿元红包的推测,数目不一定准确,但它所提出的遏制红包腐败的现实命题,则亟待整个社会作出回答。

圈点新闻 □阿黄

最坦白的收据

近日在某网出现的一篇《史上最牛政府收费》的帖子中,一张由重庆长寿区邻封镇田普村12组组长开出的收据上,写着“好处费”字样——据《重庆商报》报道,据说这是为了帮村民拿征地补偿请客吃饭的费用。

够坦白的!可见,对于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来说,“好处费”收得是天经地义,拿得是心安理得。这还是趁巧被网友给曝了光的,现实生活中,类似无所顾忌收受好处费的行为还有多少?

拥挤的举报网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紧急采取措施,通过加大存储器容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让网民24小时顺畅地登录举报中心网站。此前,该网站刚一开通,即几乎被网民点“瘫”。

举报网一开通即被点“瘫”,说明公众关注、参与反腐的热情高涨,同时也反映出当下民意表达的渠道不够畅通。升级举报网虽很必要,但毕竟只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被举报的贪官受到严惩,举报人得到保护。

见死不救受罚

据《新快报》报道,日前,广州市法制办就《广州市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二次征集民意,对医疗机构见死不救的最高罚款从1万元提高至2万元。

医疗机构见死不救,往往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把心免费救助病人的巨大费用,会影响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医疗机构见死不救的行为是应该予以惩罚,但更重要的是,尽快找到一条兼顾医院和病人的利益之路。

新闻观察 □赵志敏

据《工人日报》6月24日报道,针对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统计法修订草案中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不得公布与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不一致的统计数据”,6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中,这成了常委会委员热议的一个焦点,多位委员认为该条内容需要修改。

“统计数据打架”由来已久。公众并不希望“统计数据打架”,只是希望通过对比“打架”的数据,找到一组更加符合实际的数字,并由此推动统计方法科学性的提高。没有了统计数据失真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

图说 □赵春青/画



比数据“打架”更可怕的是数据失真

虽然,修订草案保留了一些数据博弈空间——民间调查和单位内部统计不适用于统计法修订草案。然而,如果双方实力悬殊,或他们在“化干戈为玉帛”之后,有关方面是否还会不遗余力地取信于民?这显然是公众急切了解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最近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而紧迫。”在立法规避“统计数据打架”的现实背景下,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任务,无疑更加紧迫。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无疑是规避“统计数据打架”的基本前提。

相关法律法规操作性差、处罚权限不明,要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必须加大监督执法以及责任追究的力度。毋庸讳言,某些“统计注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实际上也是此次叫停“统计数据打架”的原因之一。不过,统计部门的数据本身多半是由地方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汇总而来,更何况,在现有的统计模式下,统计部门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主管部门,难免导致其独立性的弱化。

“十几张批示不管用的”三种可能

据《新快报》报道,近日,76岁的陆侯英老人在广州市建委和市城管局的联合接访活动上“搅了一回局”——当看到市建委领导再次写下“进一步协商”的批示后,他当场拿出由14张信访事项登记表拼接而成的长卷,近两年来,他为房屋拆迁补偿不公一事不断上访,换来的只是这十余张“领导批示”。“至今已两年了,领导们每次都这样说,希望这次能落实,为我解决实际问题”,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究竟是什么大的事情,让一位七旬老人上访两年却只换回10余张没管用的领导批示呢?

大众话题 □吴杭民

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汤阴县宜沟镇前下扣村村民反映,上级给了4个低保名额,村里不按实际分配,而是安排60岁以上老人抓阄,抓上者即取得低保资格,领取低保费。抓上者每人贡献100元“中间费”,这些钱被村干部用于吃喝消费。低保费是救济款,应用在生活最困难的人身上,这样的道理谁都懂,然而有些地方,好政策却走了样,低保费成为“彩头”,既伤民心,又容易滋生腐败,不可嬉也。

之后,国家统计局终于含蓄地表示,“如果是由统计资料误差或统计工作疏漏带来的经济数据背离,则需要认真改进统计工作,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针锋相对的“打架”之后,关于自身的检讨尚且如此扭捏,那么,如果没有了“打架”对手之后,统计部门是否能够及时反省自身的不足,并积极做出整改?这大概不是不少人的担心。

因此,比统计数据“打架”更值得关注的是统计数据失真。只有不断健全管理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改善统计方法,确保数字本身的真实,才能使公众确信,叫停统计数据“打架”是为了提供准确的决策参考,而不是为了统一对外发布的口径。

据报道,老人主要投诉广州市承包总公司在拆迁他的房屋时没有丈量其房屋面积,导致补偿的房屋面积不够。22个月里,建委每月一次的接访日,他来了14次,包括主任在内的市建委多个领导都表示,要市承包总公司与业主协商解决。谁知道,22个月,拿到的仍然是类似的批示。难怪老人愤怒地质问:“这么多批示有什么用!”

现如今,各地、各部门的“接访日”、“信访日”已经成为制度,设立信访接待日的初衷,是希望在领导的重视和协调下,让百姓的困难尽快得以解决。可是22个月,老人得到的除了领导批示还是领导批示,投诉的问题丝毫没有进展。10几张领导批示就是办不成事,就是不

管用,一种可能,老人的要求不合理,这应该给老人解释清楚;再一种可能,领导的职务不高,说话分量不够;还有一种可能,下面的人没当回事,能拖即拖。记得去年发生在海南文昌市的“寻官启事”吗?文昌市锦山镇主街道一根水泥电线杆被大货车撞成两截。附近居民向有关单位呼吁多日未果,当地居民在水泥杆上张贴一张“寻人启事”,寻找有关部门领导,最后电线杆问题最终获解决——难道也要76岁的陆侯英老人在接访日张贴“寻官启事”吗?

“接访日”、“信访日”不该形同虚设。接访不是目的,接访要解决问题。老人上访两年换回10余张批示的经历还要持续多久?

时代先锋

平凡的怀念

——追记优秀共产党员、地震极重灾区四川省什邡市政府办公室干部刘庆禄(上)

新华社记者 刘大江 苑坚 叶建平

2009年1月17日,四川省什邡市一家殡仪馆,哀乐低回,鞭炮震耳,上千名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为优秀共产党员、什邡市政府办公室干部刘庆禄送行。

刘庆禄与妻子的一张合影摆放在灵柩前,这成了刘庆禄生命的定格,肩披鲜艳的大红绶带,胸前鲜艳的大红花,挽着同样装束的妻子,他微笑着,慈厚、质朴,绶带上醒目的大字十分抢眼——“抗震救灾模范个人”。

他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岗位上激情燃烧,以最后的生命守望着重建与家园恢复。一张工作照折射一个平凡生命的高度。一本名叫《忠诚》的画册里,登载着目前能够见到的刘庆禄参与抗震救灾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他正在帐篷里核对物资接收数据。照片中他普普通通几乎没人注意。然而,正是有了无数像他这样的干部,才托起灾区明天的希望。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下午4时半,余震不断。在什邡市政府的大院里,匆匆赶来的刘庆禄一把抓住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江正德。

“江主任,安排我做啥子?”“指挥部正在开会,你随时待命!”“要得!”当天晚上11时,刘庆禄押送着什邡市第一车发往极重灾乡镇的物资出发了,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终于送到了洛水中学救援现场。返回市区时,已经次日凌晨4点了,9点钟刘庆禄又马不停蹄地押送救灾物资前往岷江镇龙居中心学校救援现场。

刘庆禄同事廖行富说:“5月13日晚上,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了。天上下着大雨,物资两三点还没卸完,老刘衣裤全湿透,他回去打个盹儿,大清早又来了。”刘庆禄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病,并在2008年春节住院一个月,市政府办要求刘庆禄量力而行,但他完全不当回事。连续的高温和高强度的休息不足使刘庆禄同志的血压明显升高,在工作中时常头晕眼花,他吞服降压药继续坚持。

那些日子里,没有人记得负责救灾物资接收、发放、押运的刘庆禄究竟来回跑了多少趟。留在同行者记忆中的是,很多时还在路上运送物资,天就已经亮了。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灾区进入恢复重建的关键期,物资调拨组经历了几次裁减,从297人到90人,从44人到16人,来到最后剩下9个人,刘庆禄每次都坚持留在这个工作量很大的“灾区生命保障线”上。

2008年12月30日,什邡市委、市政府召开抗震救灾表彰大会,刘庆禄是抗震救灾物资保障的模范个人代表。办公室通知刘庆禄前去参会,他却说自己正在值班,要去几个受灾镇发放过冬物资,就不参加了。但大会要求必须本人出席。一直忙到参会前10分钟,来不及回家换件衣服,刘庆禄直接从仓库赶到大会现场。就在这里,他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影像。

2009年1月14日下午3时,从北京运来400台电暖器,杨友平和刘庆禄负责接收清点数量、检查质量,需要值班到第二天早上8时。电暖器每台重35公斤,刘庆禄总会放下接收单,和搬运工一起搬运。期间,作为市武协会副主席的刘庆禄只和武协的同志一起吃了点饭,就匆忙赶回仓库,和杨友平一起清点物

资。晚上11时左右,刘庆禄感觉身体不适、脸色发青,才发觉匆忙间将降压药忘在饭桌上了。与杨友平打过招呼后,他便赶回聚会处取药,刚进门便一头栽倒在地。经专家诊断,刘庆禄因过度劳累引发突发性脑溢血,15日中午医治无效去世。一份生死协议照亮一个红色灵魂的深度。一份责任自负的“生死协议”平摊在记者面前。

“不住院。刘庆禄”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分明显示了签字者的决心。这恐怕是什邡市人民医院医生薛道艳从业以来接到的最棘手的病案。这个倔强的病人在2008年正月初一晚上9时多进院时,病情很严重,临床诊断为“3级高血压”,收缩压高达230,这意味着随时将出现脑溢血、中风等并发症。薛道艳当即要求病人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出乎意料的是,病人拒绝了医生劝告,表示一切后果自负,愿意签字为证。于是,在什邡市人民医院门诊病人简易登记表上的“医生已告知与有病相关的注意事项”栏中,破天荒地出现了那个“奇特的签字”。而在送进医院前,病人已经连续间断性气紧3天,发作4次。薛道艳无可奈何地摇头:这是个不要命的人。

这个“不要命”的病人叫刘庆禄,当时是什邡市政府办公室行政科科长。他签订那份“生死协议”的理由很简单,第二天即正月初二,该他值班,一住院就会影响工作。(据新华社成都6月24日电)

宜昌万名党代表架通“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岳艳 通讯员陈芳 李玉林)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湖北省宜昌市组织“万名党代表进万户听民声”,要求每个党代表每年联系不同类型群众100户,入户走访不少于30户,相对固定联系党员3-5人,结对帮扶不少于1户,提交民生提案不少于1件,架起了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的桥梁。

去年7月,伍家岗区宝塔河街办党工委为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辖区7个社区开设了“党代表会客厅”,以“有话跟党说,有苦向党诉,有难找党帮”为民服务为宗旨,党代表采取每月定期在会客厅接待居民群众、到居民小区和居民家中走访等方式,了解群众需求,倾听群众呼声,关注群众疾苦,通过与居民群众零距离接触和为居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架起党群连心桥。

吃好水,是枝江马店计划村五保老人李作群的一块心病。枝江市党代表、三宁化工公司党委书记梁伦祀筹集2000多元,带领他挖水井。当清澈的水汩汩而出时,李作群老人喟叹感谢:“梁代表比亲生儿子还亲!”

宜昌市引导党代表帮助群众、企业树信心,促增长,党员干部对全市1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集中走访,梳理发展困难和问题后,分解到相关部门帮助解决。截至5月底,“党代表会客厅”共接待居民群众1000余人次,为社区居民办了200余件实事,落实了40余便民措施,处理涉及社区建设、家政服务、环境卫生、矛盾调解、就业安置、政策咨询、民政优抚等方面的事情600多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受到了居民群众的信赖。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

本报北京6月24日电(记者程莉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今天表示,与2009年3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的2008年中央预算执行数比较,中央财政收入增加15.01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增加15.01亿元。收支相抵,中央财政赤字1800亿元,控制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数额之内。

谢旭人表示,汇总中央和地方决算,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61330.35亿元,比2007年增加10008.57亿元,增长19.5%,完成预算的104.9%,全国财政支出62592.66亿元,同比增加12811.31亿元,增长25.7%,完成预算102%。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举措。

“加大力度 持之以恒 务求实效 推向纵深”

——全国“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回顾活动开展5年以来的初步成果与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者滕静)已经在我国新闻战线持续开展了5年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4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说,“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各地新闻战线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把活动作为新闻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突出问题,逐步引向深入。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惠生介绍,自2003年10月活动启动以来,我国新闻战线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解决突出问题等方面成效明显。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查处了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敲诈案、“纸馅包子”假新闻案、山西霍宝干河煤矿记者“封口费”案等一批社会影响恶劣的违规违法案件。程惠生介绍,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各地新闻单位应着眼长远,逐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逐渐形成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软约束与硬约束相结合、内部管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放眼2009年,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组织两批“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巡回报告

淮河流域水质较上年有所改善

但总体看仍属中度污染

本报北京6月24日电(记者王冬梅)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今日向媒体通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8年度实施情况称,2008年,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沿淮四省政府切实落实治污责任,淮河治污工作取得了新成效,淮河流域水质较上年有所改善。

这位负责人表示,近日环境保护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等部门,对淮河流域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南四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年)》2008年度实施情况进行了考核。从水质状况看,流域内24个

跨省断面化学需氧量评价全部达标,综合达标率100%,氨氮评价综合达标率83%,流域水质有所改善。

据介绍,沿淮四省流域治污工作虽然取得了新进展,但总体上看,淮河水质仍属中度污染,治污形势依然严峻,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突发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内工业企业密集,违法排污甚至污染事故依然存在;部分治污工程项目进展缓慢;部分出境断面氨氮污染问题凸显;城镇污水处理厂削减污染效能仍有待提高。

淮河水质较上年有所改善

但总体看仍属中度污染